王光祈与吴若膺关系考

宫宏宇

摘　要：有学者认为王光祈与吴若膺之恋是他去国和后来改学音乐的动因。本文所要聚焦的不是这段恋情是否构成王赴欧留学决定性动因的问题，而是企图通过稽查文献、搜罗轶事来对这一恋爱事实的前因后果以及另一当事人的品行做一考证。对于这段恋情，王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而其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对此事的回忆又多有乖舛和不详之处。钩沉王吴之间关系除避免以讹传讹外，还旨在探求王光祈异性情缘对其思索公共议题及选择事业时所发生的影响。王光祈与吴若膺在家庭背景、思想行为、道德品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不同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段恋情的悲剧性结局。

关键词：王光祈；吴若膺；王独清；《吴虞日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71（2008）04－0049－08

引　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王光祈的研究多注意他的公众角色，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音乐界着重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贡献，特别是他在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上所建立的新的研究范式［1］和他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的关系［2］；史学界则对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他所代表的五四人文特性、他的工读互助团的实践等课题情有独钟［3］［4］［5］。对于王光祈的私人生活，特别是他的家庭生活与异性情缘等方面的研究却有待扩展。上世纪70年代曾有台湾学者采用西方社会学"过渡人"的理论，从"五四人的悲剧型像"的角度，分析论述过王光祈的浪漫品行［6］。最近，国内学者王勇又就王光祈的恋爱生活进行了一番论证，认为他留德的主要原因是"为爱出走"，并提出了王光祈与吴若膺的恋爱为其赴欧留学的"关键因素"的论断［7］。本文所感兴趣的不是这段恋情是否构成王赴欧留学决定性动因的问题，而是这一恋爱事实的本身。对于王、吴的恋爱悲剧及其后果，海内外学者并非完全没有涉及［6］（第16－17，51－52页）［8］（第343－345页）［4］（第119－121页），但是对于王、吴之恋这一事实的前因后果以及另一当事人的情况却没有认真的考证过，所引用的史料也颇有商榷之处。本文即就目前所得的材料对王与吴的关系进行考证，其目的除了通过目击者的回忆来厘清王、吴之恋之始末外，还旨在探求吴若膺这一令王光祈心碎之女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一、王光祈同辈人中有关王、吴恋情的记载

关于王光祈与吴若膺的恋爱，除了王勇文章中［7］所援引的宗白华的回忆外，其他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大多提到过。如王在北京时的室友郭有守就提到王在北京时曾认识两位"曾在蓉城教会学校读书"的"浣花姊妹"，并与其中一位相约赴欧［9］（第28页）。但对此事叙述最详者，则是王光祈的挚

收稿日期：2008－04－30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男，博士，现任新西兰国立UNITEC理工学院语言研究系高级讲师。
课题来源：本文的研究曾得到UNITEC－New Zealand研究经费资助。

友左舜生（1893－1969）。左在王 1920 年 4 月去国后主掌少年中国学会，多年来和王不但一直保持联系，在生活上和事业上对王的帮助也最大。王光祈的著述除极少数外，都是在左舜生任职中华书局编辑期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和宗白华一样，左也是在一篇写于 1936 年 3 月的纪念文章中首先提到王“在国内曾有过的一度的恋爱史”的，并自称对“这件事的首尾我完全知道”［10］（第 93 页）。如果说郭有守的回忆证实了王吴之恋的北京肇始，左舜生后来的回忆则为我们了解这一情事之后的发展提供了线索。因为后者在一篇题名为《记少年中国学会》回忆文章中又很详细地提到王光祈和他的女友 1920 年冬经南京到上海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工作的经过：

> 民国九年［1920］的一个冬天，我在南京寓所一间斗室中的油灯下看书，忽然听得敲门声甚急，我开门一看，见是光祈，同时在漆黑的天空下，我还看见两只发光的眼睛从光祈的身后，一直射到我这边来，我于是连忙请他们两位入内，在灯光下一看，知道另一位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姐，操纯粹的四川口音，身材窈窕，举止大方，我当下心里完全明白，便顾左右而言他。问光祈出国的行期已否确定。他告我正是为了出国的准备而来，转问我能不能同他们一阵到上海去。其时我正接受了上海中华书局编辑的聘约，也正要动身，得此良伴，当然非常高兴。两天后，我和光祈同到沪宁车站，他原约定那位北京同来的小姐在车站候他，不想她早已搭上先一班的快车走了！这一下真把光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虽然只好勉强上车，可总觉得这位从来不曾到过上海的年轻小姐，可能遭遇什么不幸，我越是说一位漂亮小姐总会有办法，他便越是怀疑，加上这一天又是一个凄风苦雨的冬天，雪珠打在车窗上铮铮作响，我们这两个少年中国的少年，瑟瑟缩缩的坐在三等车厢里，各想各的心事，一会儿谈得兴高采烈，觉得天下事大有可为；一会儿又忧来无端，万念灰冷；心里越是着急，车子走得越慢，好容易挨过七八个钟头，才到达上海的北站。当我们住进一品香还不到二十分钟，一个四川女子口音的电话，便来自远东饭店，原来光祈之必住一品香，是早已和那位小姐约定的。于是一天的愁云惨雾完全吹散，光祈又依然恢复了他那飞动活泼的神情，恋爱对于一个青年人本来有这样大的魔力，我是半点也不奇怪的［11］。

关于王光祈与女友在南京短暂停留之事，当时在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会员黄仲稣后来也回忆说：“初君［王光祈］过宁时，携有女友，其人风致绰约。”［13］（第 57 页）①

但王光祈与女友是何时相识并坠入爱河的呢？郭有守是这样说的：

> 有一天若愚［王光祈］告诉我，他可以替我介绍女朋友。原来他有一次被一个朋友邀请到东站餐厅，席间会见两位浣花姊妹，不久这位朋友离开北京，送车的时候，又遇见她们，于是便约请到蓬庐。我记得第一次介绍和女士相见，未免面红耳赤。后来她们常来，厨子也更忙着预备火锅［9］（第 28 页）。

郭有守自 1917 年冬起就和王光祈在北京北河沿南头“蓬庐”共居一室，后来又同时赴欧留学，他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后来的学者，在述及此事时，虽未明确标明资料来源，但均大致依照此说，加以演绎。如台湾学者郭正昭、林瑞明在其专著《王光祈的一生与少年中国学会》中，就是这样说的：

> 王光祈在四川时就认识了以‘打倒孔家店’出名的吴虞（吴又陵），这时吴虞的两个女儿在北京，王光祈受吴虞之托，所以不时约请他们到蓬庐小叙，有时和郭有守、周润生坐汽车游游颐和园风光风光。这两位浣花姊妹，曾在蓉城教会学校读书，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当时保守的刚刚解放的社会里是显得非常大胆的、前进的。后来，王光祈和身材窈窕举止大方的二小姐，不知不觉间有了更进一步的感情［6］（第 16 页）。

同样，韩立文、毕兴在《王光祈年谱》中所作的以下陈述，似乎也来自郭的回忆：“吴若膺（又名吴楷）是四川教育界名流吴虞之女。……吴若膺与其妹吴辟疆（又名吴桓）均在北京协和大学读书。姊妹二人（人称‘浣花姊妹’）慕王光祈才学，与王往来密切，吴若膺与王光祈建立了感情。”［15］（第 35 页）王勇的论述也不例外［7］。但是，郭正昭、林瑞明的“王光祈在四川时就认识了吴虞”、他是“受吴虞之托”才“不时约请他们到蓬庐小叙”之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明显的与郭有守的回忆不符。事实是否如此，他们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根据，应当存疑。

也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早期的回忆均未提到王光祈恋人的名字。后人的研究（如郭正昭、林瑞明的专著），则出于为当事人收养的女儿尚在台湾的缘故，在正文中没有点出全名［6］（第 363 页）。最早提醒国人注重王光祈研究的廖辅叔先生最初也没有点明王光祈恋人的名字，只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的《独上昆仑发巨声》的文章中提到，在组织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期间，王深得一四川同乡女子的爱慕，不久两人即坠入爱河［14］（第38页）。廖先生虽然没指出此女子的姓名，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推断出此人非吴若膺莫属。因为廖先生所引的“［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一语出自胡适为吴之父吴虞（1872－1949）之《吴虞文录》所作之序（上海亚东书局，1921）。

王光祈作为青年领袖是极受同辈人尊重的，这从王逝世后蔡元培所做的追悼会致词以及左舜生、周太玄、李劼人、余家菊、李璜等所写的回忆文章中即可看出。二十年代在德国获博士学位，后来出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南京市市长、联合国防洪局局长、交通部部长和巴西大使的沈怡甚至把王光祈称为少年中国一百多位会员中“能真正本着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精神，不参加政治活动，一心一意以遵守少中宗旨及公约为事者”的两个人之一［16］（第41页）。就连从未与王光祈见过面的教育家、出版家舒新城，对他的崇敬之情也溢于言表［17］。但是对于王与吴之间的交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是颇有微言的。1918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方东美回忆到：②

> 光祈性格，高超纯洁，其律己之严同人中无有出其右者，唯情之所钟，独在一晚辈如花之美媛，当时少中同人群以未来中国文化创造力之一半应由全国妇女负荷之，故极力倡导妇女运动，苟因发起者一人私情溺爱之故，致令妇女运动遭受疑难挫折，将何以见谅于国人［18］。

郭正昭、林瑞明在其专著中也提到“王光祈以长辈之身份，而爱上了晚辈，这在当时‘少中’的一些会员是颇不谅解的”。但郭正昭、林瑞明由方东美文引发的以下一段解释，却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 因为少年中国学会素以未来中国文化创造力之一半应由妇女担负起，故极力鼓吹妇女运动。力倡一夫一妻；而王光祈早年在四川早已结过婚，元配太太留在四川，这时与朋友托其照顾的晚辈发生恋情，‘少中’会员一方面素来敬重他的品格的高超纯洁，一方面不愿见‘少中’发起人以一人私情溺爱之故，使得妇女运动受到疑难挫折，所以极力阻止这件事情发生，苦劝两人分赴美洲及欧洲留学。王光祈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终于答应了下来［6］（第16－17页）。

据王在成都上中学时的同学李劼人先生回忆，在成都上学时，王“已经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并表明他结婚的年月是宣统二年（1910）。王光祈的妻子比他小一岁，且为其生有子嗣。王光祈的长子生于宣统三年，可惜“数月中就殇了，辛亥年才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一岁半不到，也因出痘夭殇了”［19］（第42－43页）。很显然，和严复十二岁时娶王氏，胡适十四岁时和江冬秀定亲一样，王光祈的这次婚姻完全是奉母之命为延子嗣而已。据廖辅叔先生讲，王光祈的妻子死于1918年［14］（第38页），而王和吴的相识与相爱却是在1919年12月初的事［7］。如果妻子已死，又怎么能说王的所作所为违反妇女运动所力倡的一夫一妻制度呢？

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王光祈和吴若膺相爱之前，王是否有过自由恋爱的经历。王成都时的同学和北京工作时的挚友周太玄谈到的发生在1916秋末的一件事，就很值得注意。他说：“记得有一次，他得着20余元的收入，依理应该贡献给他一位爱人，但经过一夜的彷徨，寻思，最后他竟毅然买了一部商务出版的《外交月报》的全份。并且就此便和他的爱人断绝了关系”［20］（第20页）。这里所提到的“爱人”应该不是吴若膺，也不应该是王的结发妻子。因为吴与其妹吴桓是1919年10月才到北京的。把他已经结婚多年且为其生儿育女的妻子称为“爱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不太可能。周太玄是1916秋末到北京和王光祈“再行聚首”的，在北京时又和王光祈朝夕相处，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那么，这里所说的“爱人”又是谁呢？这是不是表明，在结识吴若膺之前，王光祈曾有过别的恋人呢？李劼人提到，在成都上学时，王尽管年纪小，但“谈到女人，却不能不让他逞强，这是他最得意的事”［19］（第43页）。这说明王并不是一个缺乏情欲的干巴巴的道学家，而是一个感情充沛的新时代人物。在五四这个“主张男女社交公开”［9］（第28页）的时代，像王光祈这样一个充满浪漫情感的诗人的后代，在感情上另有寄托，应该也是意料中的。胡适除了江冬秀之外，不是也有过恋人吗？可惜的是，史料的缺乏使得我们无法对王光祈的异性情缘有更多的了解。

有些少中学会会员提到王光祈的留学计划，王、吴恋爱的失败以及王光祈失恋后的情况。王光祈原本打算去美国之事，郭有守是这样说的：“当时若愚和我都早已准备留学。我决定赴英，他决定赴美。”但在“临时改道赴德”一事的解释上，郭却和王的口径不符。他说王是“因为两个人去费用不够，才变更计划，改赴欧洲”的［9］（第28页）。左舜生虽然对王的留学计划“完全不知”，但他知道王没有钱，“因为如此，他［王］便只好坐法国邮船的四等

舱先行，那位四川小姐乃坐下一班的三等舱后走，等到这位小姐到达巴黎以后，光祈即从柏林前往欢迎”［11］。廖辅叔也称王光祈本打算与吴若膺“同赴德国。但是王光祈的出国是靠他的朋友帮助的，他的朋友又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负担他俩的旅费，因此约好光祈先走，一俟他在德国站住了脚之后，即给她汇寄赴德的旅费”［14］（第 38 页）。

关于王光祈和吴若膺的最终分手，大部分少年中国会员都提到过，但都非常简略，也没有细说缘由。如黄仲稣谈到此事时，只提到“以别有所恋，中途相背”［13］（第 57 页）。连王光祈在法兰克福时朝夕相处的同伴魏时珍、宗白华对此事也没有过多地表白。在 1936 年 3 月 15 日举行的追悼会致词中，宗白华只是简单地提到王“到欧后，恋爱又幻灭”［21］（第 105 页）。只有左舜生对此事叙述颇详，他说“等到这位小姐到达巴黎以后，光祈即从柏林前往欢迎，绝没有想到她在来法的途中，已与另一位同船的王姓青年发生了不可分的关系，竟视光祈如路人!”［11］。廖辅叔后来对王光祈与吴若膺分手的叙述，与左舜生大致相仿。他说，王光祈到德国后“把他卖稿所得的积蓄全数寄给了她，她也立刻买了去法国马赛的船票。想不到她上船之后却遇到了王独清。四十天的海上生活，王独清竟抹掉了王光祈在她心中的形象。船到马赛，她已经决定与王独清同去巴黎，再不向德国多走一步了。这边的王光祈望穿秋水，音信杳然，直到李劼人从巴黎发出的长信送到他手中之后，他才如梦初醒。于是星夜赶去巴黎，经过实地调查，证实了李劼信中所说的‘事已不可为’，于是又星夜赶回法兰克福”［14］。廖先生不是这一事件的直接见证者，也没有标明所述事实的史料根据。但他所说的吴若膺与王独清之恋爱的经过与左舜生等大多数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回忆是相吻合的。但是，被认为是“劝王光祈离开吴女的当事人之一”的方东美在多年后就此事所作的回忆却与以上的叙述颇有出入：

> 据舜生为余言，舜生在沪，曾尽一日夜之力，苦劝此一对爱人分赴美洲及欧洲留学，已成定计矣，讵知起航之日，两人竟又同舟过港赴欧矣［18］。

令人费解的是，方的回忆不仅明确提出王光祈和吴若膺是“同舟过港赴欧”的，其中还就他和左舜生以及另一少中学会会员李儒勉得知此事后的反应有以下详细的记载：

> 舜生由沪回报此信，搔首不知所措。余时年甫二十，于光祈为小弱弟，而友谊又不及舜生与光祈久且厚，一闻此讯，乃与李儒勉露夜合草一长函，词严意正，大陈其‘七不可’，寄请新加坡船公司妥交［18］。

方东美还明确地指出王光祈收到他与李儒勉合草长函的具体时间、地点与反应：

> 光祈旅途得此函，于抵达马赛港时，覆我一明信片，直云：函悉，此心已明，此计已决，迨抵巴黎后，孑然一身，遄赴德国学习音乐以终了此生，言短而哀怨之情如泣如诉矣。其后悠悠 16 年中光祈宅神音乐，归魂艺术，竟成一代完人而穷愁客死异域，可敬亦复可哀矣［18］。

更有意思的是，除了对王光祈后来改学音乐，客死他乡，一直深怀愧疚外，方东美的回忆还提到多年后见到王光祈恋人以及后来的一些情况：

> 扼杀伯仁，我故不能辞其罪也。抗战初期，曾慕韩先生抵重庆，为言某女子别光祈后久久，乱发素装，不似当年之明艳矣。余亦转告慕韩，北伐后女士归国，嫁我旧日同僚某教授，某次余游西湖过沪趋访某教授，其新妇犹避不一见，后数年随夫留京，已淡忘从前，频相过从，时余长子犹在襁褓中，且抚抱之极亲切。前此一腔幽怨，怨我拆散光祈，乃又化为晚照晴霞矣［18］。

很显然，方东美的把自己责怪成棒打鸳鸯的恶人，把背弃誓言的薄情女描述成了痴情的怨妇。这一点，他在 1974 年 1 月 12 日王光祈 38 周年逝世纪念日的一次与访问中又再一次确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谈是《王光祈的一生与少年中国学会》的作者林瑞明专门为澄清王恋爱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做的，而且“长谈了一个晚上”。林瑞明在《校稿附言》中特意提到：“方先生把事情始末完全说出，但也一再交代名字一定不得发表，”并解释说：“女方的名字所以不见于文字记载是因为后来她嫁给了中央大学某教授为妻，以后辗转也来了台湾。虽然早已逝世，但她收养的女儿尚在台湾，所以她的名字就如此隐了下来。”［6］（第 363 页）

王光祈的确是 1920 年 4 月 1 日从上海乘法国船赴欧洲的，但同行的是少中国学会员魏时珍、陈宝锷等，并没有吴若膺。这不仅从王当年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通讯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2］，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回忆中也可以得以证实。郭有守说，王光祈于“民九［1920］春间先乘法轮四等舱经法转德。约着后去的小姐相见于马赛。结果是第二次轮中出了岔子，若愚白跑了一趟马赛”［9］（第 28 页）。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李璜也提到：“不久

光祈忽以私事自德国佛郎克埠来巴黎，住只半日，坚留为什么不下，太玄与我送之车站，执手不觉泪下，光祈从此以兹私事含痛，或竟至其死时。”[23]（第34页）吴虞在同年5月15日的日记中也记载：“楷女来信：阳历5月8号，乘法船到巴里。”[26]（第539页）

吴若膺与创造社著名诗人王独清的恋情也确有其事。这一点除了以上廖辅叔的论述外，也可从李建忠《王独清轶事钩沉》一文中得到证实。据李建忠考证，王独清从1920年春至1925年底一直在欧洲各地流浪。他的确是在赴欧船上结识并与“去欧洲寻觅其未婚夫的”吴若膺堕入爱河的，“到法国后俩人遂同居在了一起”[24]。郑超麟在一篇关于萧三和王独清的回忆文章时也提到吴虞吴又陵之女吴若膺是“王独清的爱人”[25]。顺便说一下，王独清和吴若膺的恋爱来的快，去的也快，并没有维持多久。郑超麟提到王独清和吴若膺的关系破裂后“这件事在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中传说很多”[25]。关系破裂的原因同样是出在吴身上，是“吴若膺另有所爱，离开了王独清”[24]。失恋后的王独清和王光祈一样“痛苦已极，精神崩溃，几乎投湖自杀”[24]。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方东美所描述的王光祈恋爱事件是那样的有眉有眼有始有终，似乎不能简单的用一句记忆有误的话来解释。作为一个极其受人尊重的学者，方东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制造出一出王光祈与吴若膺之恋的肥皂剧。可惜现在方先生已于1977年逝世，这个谜底可能永远也不会解开了。

二、《吴虞日记》中的王光祈与吴若膺

王光祈与吴若膺的交往的细节也可从吴女之父的《吴虞日记》中有关的记载窥见一斑。《吴虞日记》虽然没有提到王光祈与吴若膺的恋爱关系，但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王和吴的留学计划及筹划过程。如吴虞在1920年1月15日的日记中提到“楷女来信”时云，“阳历2月2号当同王光祈出国”[26]（第516页）。几天后，吴虞在1月19日的日记上提到留学的目的地：“楷至法，桓至美。”[26]（第516页）1月22日的日记又再次提到：“楷将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若愚（名光祈，泽山先生之孙），准于阳历2月初旬一赴美留学，一赴法俭学，意皆坚决异常。”[26]（第517页）

从吴虞的日记中所摘录的吴若膺的来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吴的留学计划的制订与实施都是在王光祈的影响下完成的。如摘录在他1920年1月24日日记中的吴若膺来信，不仅提到了她留学计划起因（“前星期我们在《少年中国》上看见王光祈的著作，我们便去会他，后来我们慢慢的商议，也就定了主意，出去工读”）、启程日期（“阳历2月1号动身出京”）、具体行程及沿途的活动安排（“桓由潘力山帮助到美国，我则同王光祈及北京大学几位先生到南京、西湖一游，再到上海，过南洋新加坡募款及创办通信社与演说，要提醒那边的华侨。……现在楷决定先到南洋一行，若天气不顶热，便在那里小住”），还提到了此次留学活动的费用安排（“现王光祈已将旅费及住法费用预备好了，大人若愿每年寄二百元，亦甚感激，家中若窘，则每年可寄百元与楷”）[26]（第518－519页）。摘录在2月19日日记中的“楷女来片”又提到：“2月6日出发，一切费用均已备妥。”并提到，她此次留学的时间安排（“在外至少须六年，始得返国”）以及所新近结交的朋友（“近日预备甚忙，而有四川同乡诸君，如康白情、孟寿椿、罗家伦、王光祈等，常来畅谈出国进行事”）[26]（第523页）。3月8日日记中摘录的“楷女来片”还清楚的记录了王光祈与吴若膺出国前的行程和活动安排：“2月11号早八点同王光祈出京，11点半到天津，买通车票到南京，12号午后1时到浦口渡江，到对岸复乘马车入城……14号午前11点40分由南京起身到上海……在此候船，大约住20余日，尚要往西湖一游，返上海时，大约止住数日，即可动身。”又信言：“现同王、高两女士及左学训、王光祈诸君住一处。”[26]（第527页）4月23日的日记记载吴若膺“由上海宝山路华兴里66号寄”的来信时提到“王光祈4月1号早起身”。并提到“王光祈到欧系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三处特约通信，每年一千二百元，魏嗣銮同用此款，光祈每年还可助款二、三百元”[26]（第535页）等细节。这些都与以上所引的左舜生的回忆和当时《少年中国》刊登的有关通讯相吻合。

从《吴虞日记》中可以看出，王光祈不但是吴若膺旅欧的始做俑者，也是吴女参加各种进步活动的介绍鼓动者。在王光祈的影响下，吴加入了各种青年团体。如在1月19日的日记上，吴虞提到：“［孙］少荆得王光祈信云，楷、桓将入少年中国学会。”[26]（第516页）王光祈、孟寿椿、康白情、康纪鸿、陈启修、付汇川、杨廉、熊训启等人为创造新四川而发起《新四川》杂志社时，“第一次社员中北京有楷、桓”[26]（第520页）。吴虞2月1日的日记还记载，“楷女寄回王光祈介绍楷女入新四川杂志社书及新四川杂志社章程一份”[26]（第521页）。

《吴虞日记》中记载的吴出国和与王光祈分手前后的一些情况也很值得注意。如1920年4月23日的日记提到，王光祈4月1号赴欧后，吴随宗白华学“德文，自修英文”［26］（第535页）。这证明了吴若膺虽然没有和王光祈一起赴欧，但的确如左舜生所说的那样，因为王“没有钱……他便只好坐法国邮船的四等舱先行，那位四川小姐乃坐下一班的三等舱后走，等到这位小姐到达巴黎以后，光祈即从柏林前往欢迎”［11］。吴虞1920年5月到9月日记中的一些记载，如5月15日“楷女来信：阳历5月8号，乘法船到巴里……到巴里住一礼拜，才往瑞士，乘飞艇到德”［26］（第538页）；8月9日“楷女来明信片，5月23日到星加坡，26日到哥仑布，6月3日到其布丁，九号到波赛，再一礼［拜］即可到巴黎矣”［26］（第538页）；9月11日“楷女同王瑞华、胡蜀英二女士俱入法国蒙达尔中学，到德国者止王光祈一人”［26］（第554页）也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三、《吴虞日记》中的吴若膺

《吴虞日记》不仅印证了少年中国会员的回忆，也为我们了解吴若膺的为人提供了佐证。从以上的材料我们对吴女的人品已大致有了一个印象。从以下吴虞的日记中我们更可以看出，王光祈和吴若膺的结识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属于同一路人。

王光祈出身贫寒，在生活上历来是非常节俭的。但王绝不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对他认定有益的事，他绝不吝啬。如1918年他曾出资将曾琦为《救国日报》所撰的社论以《国体与青年》为题刊行［27］。他自己生活俭朴，但对朋友却慷慨。左舜生1926年秋留法期间就曾接到王从德国寄来的美钞25元，要他“停止自炊，过两星期较丰裕的生活”［12］（第30–31页）。左舜生知道“这个钱是三、四元一千字换来的”。而吴若膺则不同，她是个养尊处优一点儿也吃不得苦的人。在花钱上，尤为奢侈，吴虞的日记中几乎每隔几天就有吴女索钱的记录。特别是在1920年出国前的几个月，吴女要钱的的频率更为频繁。如1920年1月8日的日记记载，“楷女来信，言校中下星期二当放假，…楷当去住堂，请速兑款。……楷此时专习英文，预备去美，因学医，每年须二百元”［26］（第513页）。1月15日日记中的“楷女来信”又以“阳历二月二号当同王光祈出国”为由向吴虞索求寄款。不等吴虞回信，吴若膺“已在守瑕处借银50元，买皮衣一件，布衣两件”［26］（第516页）。同月的日记中还数次提到吴女到处借钱的丑行，在“二叔处一钱也借不出。楷不得已乃在邓处去借”［26］（第518页）。3月初，吴若膺路过南京“到邓处借款未得”时，“楷愤极”［26］（第527页）。4月10日的日记提到楷女来信“嘱电汇银二百元”［26］（第533页）。不多久（4月30日）又“索银二百元”［26］（第536页）。临出国前（5月8号）又“在康白情［40元］、周太玄［一百元］处贷款，始成行。”并告知她此次”自京至上海，旅费及改装及游历西湖、苏州、惠山、南京各处，用费已五百元。自上海到法，亦须三百元”［26］（第539页）。

到欧洲后，吴若膺没有了王光祈每年二、三百元的助款，这使得她的境况变得更为窘迫，“现在住学校一切费用，完全是法华教育会担任”［26］（第571页）。但和以往一样，吴没钱时仍旧向家里人伸手，“不然，就仍借教育会款”［26］（第572页）。吴虞1921年12月15日的日记证实，吴若膺“年来学费，初半年受法华教育会之维持，家款添补书籍衣服杂用费，今年法华教育会停止。自西历3月起至本年终止，又得法下议院某夫人之助。……郭步陶寄楷中币50元……彼知楷境遇颇苦，故每年愿助楷百元，今年已寄80元矣”［26］（第662页）。1922年12月吴若膺在法国混不下去决定回国时，又给吴虞寄信“明春望汇一、二百元去作路费”［28］（第71页）。半年后吴若膺又来信“索贰百之作路费”。吴总是没完没了的要钱，弄的吴虞非常恼火，他在日记中发牢骚说“此养女之好处也”［26］（第115–116页）。

王光祈是一个做事极有恒心的人，而吴若膺做事却是三分钟热气，没长性。从《吴虞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吴若膺与王光祈分手后，大部分时间留在法国，学业上雄心勃勃，但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刚到欧洲时，她告诉吴虞她“现在正努力习英、法文，预备一二年后，即从事译述”。除了“在校除专习语文外，一切外界事，悉行拒绝”［26］（第571页）。并信心十足的说，她“预备考入［里昂大学］，再补习二年法文，即直进巴里国立大学文科”［26］（第572页）。但3个月不到，她就致信吴虞说“现在为实用起见，注意研究哲学教育”并保证“这次再不改变了”［26］（第585–586页）。半年不到，吴若膺又“言4月迁至底雄一所预科大学”［26］（第623页）。没过多久，吴若膺又“到里昂，并往里大交涉”［28］（第18页）。1922年2月，吴楷终于被法国里昂大学文本科所接

受［26a］（第30–31页）。但就在同年8月，她又突然跑到德国柏林去了［28］（第57页），而且没过多久就来信告诉吴虞说她已经“定于明夏同君毅回国”［28］（第71页）。对于吴女的好高骛远，好逸恶劳，做事情没长性，吴虞多次在日记中吐露出他的不满之情：“楷女来信……信中仍空想空话满纸。”［28］（第81页）“凡遇楷事，皆不爽快，多波折，可怪也”。但吴若膺毕竟是他的女儿，在同一篇日记中，他写到：“作与君毅书，嘱挈楷同归，路费不足，请酌量补助，我当照还。”［28］（第116页）吴虞对吴若膺的百般无奈也从侧面证明王光祈与吴若膺的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悲剧的结局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

四、王光祈与吴若膺之恋对其之影响

王光祈与吴若膺私人情感对他改学音乐可能带来的影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大多提到过，但都是揣测之言。如左舜生就认为对王来说，吴移情别恋“这一打击非同小可，于是光祈乃一气重返德国，经过一时期的痛苦以后，始得恢复他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的正常生活”。并推测说：此事“与他后来专攻音乐，乃至留德十余年不肯回来，不是没有关系的”［11］。黄仲稣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以［吴若膺］别有所恋，中途相背。君懊恼万状，无以自遣，因习提琴。时或百感横集，岂必长歌当哭，风前月下，一琴在手，亦复婉转抑扬，足以诉愁。君之习乐，初以自慰，及既有所得，复于乐理乐史探索不懈，十年如一日。”［13］（第57页）与王光祈同船赴欧的陈剑翛在分析王光祈改学音乐的动因时则试图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突变，他写到：“其所以忍着痛苦，留学德国十余年不归，卒能达到音乐理论上很深的造诣，我想当然是有别的缘故。人类心理每有不得已的原因不获达到的预定的某种目的，便求偿于它种事业，这叫做Compensation［补偿］。若愚之隐遁于艺术以终其身，或许有这种关系。”［29］（第32页）王光祈自己从未提及此事，也从未正面解释过自己改学音乐的原因，只是在给1921年黄仲稣的回信中含蓄地说“近于政治经济诸科，拟暂舍弃，将专攻音乐，明知其繁复，不易有功，顾迩来心境颇恶，非此不足以悦性灵，培植热情”［13］（第55页）。

王吴之恋的悲剧结局对王光祈的打击非常大，和王一起在法兰克福和柏林住过的宗白华就提到“他的恋爱事件，使他精神上很痛苦，到欧后，恋爱又幻灭，他受了这重大的刺激，几乎自杀”［21］（第105页）。无论失恋是否是王光祈改学音乐的决定性因素，其结果是他性格的极大改变。1922年人德累斯顿大学的沈怡回忆说：“德国留学界中，几乎不大知道有王光祈这样一个人，与人落落，很少往来；即使有人知道，也只把他当作一个很怪癖的人看待。”［16］（第52页）同时期在德国就学的滕固也回忆说：“有一次是某年的除夕，我们约莫二三十人在饭店聚餐，难道王先生也来参加。席间诙谐杂陈，而他终保持声色无动于衷的澹泊之气度。”［30］（第91页）在北京就与王光祈有过频繁接触的付斯年在德国见到他时，觉得他“比以前更寡言笑”［31］（第55页）。这一落落寡和的形象与先前风采飞扬的青年领袖的形象是有相当大的反差的。

结　语

以上笔者就少年中国会员（特别是少中会员中的中国青年党人）所写的回忆材料和吴若膺之父吴虞的日记对王光祈与吴若膺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考证。王吴之恋充分展示了王性格中感性的一面，左舜生曾多次感叹说王光祈“毕竟是五四时代的一个青年……因此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上，到底还是带着几分的浪漫色彩”［11］。这一浪漫性也决定了王光祈在个人情感上的盲目性和最终的失败。王光祈与吴若膺的相恋从一开始就是浪漫多于理性，再加上两者在家庭背景、思想行为、道德品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都存在着无可跨越的鸿沟，这些根本不同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段恋情的最终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

如引言中所述，本文所要聚焦的不是这段恋情是否构成王赴欧留学决定性动因的问题，而是针对对这一恋爱事实，通过稽查文献、搜罗轶事来追溯事件的前因后果。但以上的考证也证明王赴欧留学的确是与王吴之恋并行的。王、吴之恋的失败也无疑是促成王光祈后来改学音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如果把王赴欧留学仅仅理解成“为爱出走”则似乎有简单化的倾向。王光祈的海外求学以及赴欧两年后改学音乐、倡导礼乐复兴，并以之为实现其少年中国理想之手段，除恋爱外，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笔者在以前发表的论文中曾就此话题通过分析他在德国的经历，特别是他初抵德国时所经历的“辜鸿铭热”、“德国人之研究东方热”进行过讨论，认为王光祈此间对中国文化的重视是有内在和外在的因素的［32］。我们知道，王光祈从1920年4月1日去国到1936年1月12日猝逝于波恩医院，在德国留学工作将近16年，他成年生活的一大半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在德国，他先后经历

了一战后德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再次兴起、西方文化危机论的普遍流传、德国知识阶层对东方文化的渴求以及纳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肇始。除了英美社会进化论和德奥人类学者继之提出大文化传播论思想对他明显的影响外，他所处的环境（法兰克福、柏林、波恩）、所接触的师友（如尉礼贤、福兰阁、海尼士）及其耳闻目睹的事件都对他的思想演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33］。

①黄仲稣（1895 - ?），安徽舒城人，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发起人之一，1920 年金陵大学文科肄业，秋赴美留学，得伊利诺大学文学士，继留法，得巴黎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先后在武昌师大、东南大学、大夏大学等校任教。

②方东美（1899 - 1977），安徽桐城人，1918 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组织少中南京分会。1921 年留美，先后在威斯康辛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黑格尔哲学，1924 年完成博士论文。1923 年与在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孟寿椿、康白情等一同加入中华教育改进社。回国后，先后在国立武昌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等任哲学教授。

参考文献

［1］黄翔鹏．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 - 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百周年的随想录［A］．中国人的音乐学［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2］俞人豪．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J］．成都：音乐探索．1986（3）：46 - 51．

［3］Levine，Marilyn．*The Found Generation*：*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M］．Seattle &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

［4］Gong，Hong - yu（宫宏宇）．*Wang Guangqi*（*1892 - 1936*）：*His Life and Work*（王光祈评传）［D］．Auckland：University of Auckland，1992．

［5］Gong，Hong - yu（宫宏宇）． "Wang Guangqi and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J］*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9．1（2）：5 - 28．

［6］郭正昭，林瑞明．王光祈的一生与少年中国学会［M］．台湾：环宇出版社，1974．

［7］王勇．还历史一段真相——关于王光祈留德原因的重新考证［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2）：14 - 20．

［8］韩立文，毕兴．王光祈生平事略［A］．王光祈研究论文集［C］．立文、毕兴、朱舟（编）．成都：内部出版，1985．

［9］郭有守．若愚在蓬庐［A］．王光祈先生纪念册［C］．上海：内部出版，1936．

［10］左舜生．悼光祈［A］．王光祈先生纪念册［C］．上海：内部出版，1936．

［11］左舜生．记少年中国学会［J］．台湾：传记文学．1979．35（1）：35 - 36．

［12］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C］．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

［13］黄仲稣．哀辞［A］．王光祈先生纪念册［C］．上海：内部出版，1936．

［14］廖辅叔．独上昆仑发具巨声［J］．北京：人民音乐．1983（6）：37 - 40．

［15］韩立文，毕兴（编）．王光祈年谱［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

［16］沈怡．追忆光祈兄［A］．王光祈先生纪念册［C］．上海：内部出版，1936．

［17］舒新城．哭王光祈兄［A］．王光祈先生纪念册［C］．上海：内部出版，1936．

［18］方东美．苦忆左舜生先生［J］．台湾：传记文学．1969，15（5）：56 - 58．

［19］李劼人．诗人之孙［A］．李劼人选集［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第 5 卷，40 - 45．

［20］周太玄．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A］．王光祈先生纪念册［C］．上海：内部出版，1936．

［21］宗白华．南京的追悼会致词［A］．王光祈先生纪念册［C］．上海：内部出版，1936．

［22］王光祈．去国辞［J］．北京：少年中国．内部出版，1920．1（11）：50 - 51．

［23］李璜．我所认识的光祈［A］．王光祈先生纪念册［C］．上海：内部出版，1936．

［24］李建忠．王独清轶事钩沉［J］．北京：新文学史料．2000（2）：187 - 191．

［25］郑晓云．郑超麟谈萧三王独清［J］．北京：新文学史料．1999（1）：111 - 113。

［26］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C］．（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7］秦贤次．曾琦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J］．台湾：传记文学．1976．29（2）：33 - 36．

［28］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C］．（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9］陈剑翛．与王若愚同赴欧的追忆［A］．王光祈先生纪念册［C］．上海：内部出版，1936．

［30］滕固．悼王光祈先生［A］．王光祈先生纪念册［C］．上海：内部出版，1936．

［31］付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A］．王光祈先生纪念册［C］．上海：内部出版，1936．

［32］宫宏宇．王光祈初到德国［J］．武汉：黄钟，2002（3）：13 - 21．

［33］宫宏宇．王光祈与德国汉学界［J］．北京：中国音乐学［J］．2005（2）：75 - 86．

（责任编辑：王　璐）